

*Study on Historical Culture and Literature of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唐宋江南历史 文化与文学研究

傅绍磊 郑兴华 著

江南文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Study on Historical Culture and Literature of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唐宋江南历史 文化与文学研究

傅绍磊 郑兴华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江南历史文化与文学研究 / 傅绍磊, 郑兴华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308-18905-7

I. ①唐… II. ①傅…②郑… III. ①文化史—研究
—华东地区—唐宋时期②地方文学—文学研究—华东地区
—唐宋时期 IV. ①K295②I20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302426 号

唐宋江南历史文化与文学研究

傅绍磊 郑兴华 著

责任编辑	张小苹
责任校对	胡 畔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隆盛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95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905-7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江南文化



自序

江南地灵人杰，自古繁华，唐宋时期文化昌明，文学锦绣，蔚为大观，是说不尽的话题，值得研究。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通过会稽孔氏、吴郡陆氏、兰陵萧氏、琅琊王氏等四个有代表性的隋唐江南士族转型案例揭示江南士族在唐宋变革中的多元化状态；第二章通过唐诗中的严子陵、西施，白居易、杜牧在浙西时期的诗歌创作研究隐逸文化、吴越文化影响下唐诗对浙江自然山水、历史文化的表达；第三章选择对南唐历史有深刻影响的“东海鲤鱼飞上天”为个案揭示五代时期江南地区政治、文化的整合情况；第四、五、六、七章从宋金和战中的高、孝两朝翰林学士、高宗朝书籍禁毁、贾似道与宋末士风、韩愈《平淮西碑》公案等方面集中研究南宋江南政治文化生态。

本书相关章节或已公开发表，或在公共媒体公开播出，获得普遍好评，集结出版，作为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是为序。

傅绍磊

2018年8月17日

目 录

第一章 隋唐时期江南士族考论	(1)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会稽孔氏	(1)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吴郡陆氏	(10)
第三节 隋唐时期的兰陵萧氏	(20)
第四节 隋唐时期的琅琊王氏	(28)
第二章 唐代两浙文学散论	(38)
第一节 隐逸文化语境中的严子陵	(38)
第二节 吴越文化与西施形象流变	(50)
第三节 白居易的政治困境与浙西山水诗歌	(62)
第四节 牛李党争中的杜牧与浙西诗文	(86)
第三章 释“东海鲤鱼飞上天”	(105)
第一节 “东海鲤鱼飞上天”的出现及其宗教渊源	(105)
第二节 徐知诰与“东海鲤鱼飞上天”	(109)
第三节 “东海鲤鱼飞上天”的地域文化渊源	(113)
第四章 南宋前期翰林学士考论	(119)
第一节 翰林学士与宋高宗朝政局	(119)
第二节 宋金和战与宋孝宗朝翰林学士	(133)

第三节 周必大翰苑诗歌平议	(140)
第五章 宋高宗朝书籍禁毁探微	(147)
第一节 神宗、哲宗实录禁毁	(147)
第二节 道学书籍禁毁	(150)
第三节 正史、私史禁毁	(153)
第四节 余 论	(155)
第六章 贾似道与宋末士林新探	(158)
第一节 贾似道的士林之誉	(159)
第二节 贾似道的士林之毁	(163)
第三节 贾似道与宋末士林转型	(165)
第七章 韩愈《平淮西碑》公案新探	(169)
第一节 图复河湟与韩碑废弃	(169)
第二节 党争、崇苏与韩碑定论	(173)
参考文献	(187)
关键词索引	(197)
后 记	(199)

第一章 隋唐时期江南士族考论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会稽孔氏

《晋书·孔愉传》：“孔愉字敬康，会稽山阴人也。其先世居梁国。曾祖潜，太子少傅，汉末避地会稽，因家焉。”^①会稽孔氏自孔潜由北入南以来，繁衍生息，逐渐成为当地大族，对南朝政治产生了难以忽视的影响，同时自身也不断发展，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张承宗、孙中望以晋宋政治为背景，细致地勾勒出会稽孔氏从次等士族到东南豪强到士族显贵再到文化世族的全过程；吴正岚以孔稚珪《北山移文》为个案探讨了会稽孔氏的道教信仰；李小红论证了会稽孔氏在南朝不同于顾陆等文化世家和周沈等武力强宗的独特的家族发展道路；王永平则对会稽孔氏在东晋南朝时期秉正不挠、重视事务、谄练故实的从政作风和经律兼修、逐渐玄化、重视文学艺术，佛道并尊的家族文化进行了深入探索。^②

现有研究成果材料翔实，论证充分，很有启发意义，但是，关注的焦点都是东晋南朝时期的会稽孔氏。隋唐代兴，融合南北，会稽孔氏也在新的历史时期

① 《晋书》卷七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51页。

② 张承宗、孙中望：《会稽孔氏与晋宋政治》，《浙江学刊》2000年第5期，第131—135页；吴正岚：《论孔稚珪的隐逸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关系——兼论〈北山移文〉的主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76—80页；李小红：《六朝会稽孔氏家族研究》，《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46—50页；王永平：《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孔氏家族文化探论》，《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2期，第126—130页；王永平：《略论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山阴孔氏之从政风尚》，《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24—29页。

有着新的政治文化走向,对此学界却无人问津,颇为遗憾。有鉴于此,本文将根据现存史料,梳理会稽孔氏在隋唐时期的政治文化走向,同时分析原因,在此基础上论述会稽孔氏在南北融合、士族转型的历史潮流中的态度和表现。

会稽孔氏在隋朝普遍仕宦不显,《旧唐书·孔绍安传》:

十三,陈亡入隋,徙居京兆鄠县。闭门读书,诵古文集数十万言,外兄虞世南叹异之。绍新尝谓世南曰:“本朝沦陷,分从湮灭,但见此弟,窃谓家族不亡矣!”时有词人孙万寿,与绍安笃忘年之好,时人称为孙、孔。绍安大业末为监察御史。^①

《隋书·孔德绍传》:

会稽孔德绍,有清才,官至景城县丞。^②

《南史·孔范传》:

初,晋王广所戮陈五佞人,范与散骑常侍王瑳、王仪、御史中丞沈攸,过恶未彰,故免。及至长安,事并露,隋文帝以其奸佞谄惑,并暴其过恶,名为四罪人,流之远裔,以谢吴、越之人。^③

孔范身负奸佞谄惑之罪名,遭到流放,后裔也难容于隋朝。《宋高僧传》:

曾祖范,陈都官尚书;祖祀,祠部侍郎;考顶坐逃海避隋,择木归舜,贞观始拜尚乘直长,咸光复儒业,旁通释教。^④

孔绍新“本朝沦陷”云云,《新唐书·孔绍安传》记载系虞世南所言,事实上,家国败亡,分从湮灭是入隋江南士人的普遍感受,《陈书·鲁广达传》:

① 《旧唐书》卷一九〇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82、4983页。

② 《隋书》卷七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49页。

③ 《南史》卷七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42页。

④ 《宋高僧传》卷一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1页。

广达怆本朝沦覆，遘疾不治，寻以愤慨卒，时年五十九。尚书令江总抚柩恸哭，乃命笔题其棺头，为诗曰：“黄泉虽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①

这是当时隋朝排斥江南士人的必然结果，《陈书·姚察传》：“文帝知察蔬菲，别日乃独召入内殿，赐果菜，乃指察谓朝臣曰：‘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隋书·许善心传》：“上顾左右曰：‘我平陈国，唯获此人。既能怀其旧君，即是我诚臣也。’”^②但是，姚察、许善心并没有获得相应的重用，而只是以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角色混迹于文帝朝。当时，入隋江南士人境遇不堪者大有人在，《隋书·虞世基传》：“及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③炀帝登基，江南士人虽然获得一定程度的重用，但是，并没有真正得到炀帝的信任，《隋书·虞世基传》：“帝幸江都，次巩县，世基以盗贼日盛，请发兵屯洛口仓，以备不虞。帝不从，但答云：‘卿是书生，定犹怛怯。’于时天下大乱，世基知帝不可谏止，又以高颉、张衡等相继诛戮，惧祸及己，虽居近侍，唯诺取容，不敢忤意。”^④虞世基是大业年间“五贵”之一的江南人士，尚且消极自保，实际上，江南士人在大业年间多以文学侍从的身份与炀帝唱和。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

江表自东晋已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于是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侓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凌、饶州吴世华、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杭州杨宝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啗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⑤

① 《新唐书》卷一九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83页；《陈书》卷三一，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20页。

② 《陈书》卷二七，第352页；《隋书》卷五八，第1424、1425页。

③ 《隋书》卷六七，第1572页。

④ 《隋书》卷六七，第1573页。

⑤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529、5530页。

时在开皇十年十一月,距离隋朝灭陈不到两年。江南叛乱声势浩大,一呼百应,文帝对江南政策的失误只是导火线,根本原因是隋朝灭陈,南北统一而并没有真正融合,而这也是入隋江南士人遭到排斥的根本原因。^①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隋末乱世之际,会稽孔氏表现出对隋朝强烈的政治离心倾向,纷纷依附各个割据势力,甚至成为核心成员。

《旧唐书·孔绍安传》:“绍安大业末为监察御史。时高祖为隋讨贼于河东,诏绍安监高祖之军,深见接遇。及高祖受禅,绍安自洛阳间行来奔。”^②李渊受禅在义宁二年五月,建立唐朝。当时王世充已经割据洛阳,与唐朝势同水火,孔绍安自洛阳入唐足以说明在河东时与李渊关系密切。《旧唐书·窦建德传》:

武德元年冬至日,于金城宫设会,有五大鸟降于乐寿,群鸟数万从之,经日而去,因改年为五凤。有宗城人献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绍曰:“昔夏禹膺箓,天锡玄珪。今瑞与禹同,宜称夏国。”建德从之。

二年,宇文化及僭号于魏县,建德谓其纳言宋正本、内史侍郎孔德绍曰:“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矣,请与诸公讨之,何如?”德绍曰:“今海内无主,英雄竞逐,大王以布衣而起漳浦,隋郡县官人莫不争相附者,以大王仗顺而动,义安天下也。宇文化及与国连姻,父子兄弟受恩隋代,身居不疑之地,而行弑逆之祸,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贼也。此而不诛,安用盟主!”建德称善。^③

值得注意的是,孔德绍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攻击宇文化及有利于窦建德集团在当时群雄割据的形势下取得政治优势,甚至进一步取隋而代之,所谓“此而不诛,安用盟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坚决支持窦建德恰恰从反面说明孔德绍对隋朝的政治离心倾向。在窦建德建国、攻击宇文化及的决策过程中孔德绍都参

① 王永平认为江南士人在炀帝朝已经获得政治、军事权力,强势崛起,见于《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42—54页。如果以文帝朝为参照,江南士人的政治地位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当时作为一个地域性政治集团的江南士人是否已经崛起,值得商榷。王胄、虞绰等人与杨玄感结交,裴蕴、虞世基等人死于江都之变都足以说明在关陇集团的压力之下江南士人弱势的政治地位,这不可能凭炀帝的一人之力在短时间里获得根本性改变。而且,刚愎自用的炀帝也并不完全信任江南士人。

② 《旧唐书》卷一九〇上,第4983页。

③ 《旧唐书》卷五四,第2237、2238页。

与其中,可见其在窦建德集团中的地位之重要,《新唐书·孔述睿传》:“高祖德绍,事窦建德为中书侍郎,尝草檄毁薄太宗,贼平,执登汜水楼,责曰:‘尔以檄谤我云何?’对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贼乃主邪?’命壮士摔殒楼下。”^①孔德绍《为窦建德檄秦王文》言辞虽然咄咄逼人,但是很有分寸,根本没有对李世民或者唐朝的不逊之意,与窦建德关系密切才是李世民欲杀孔德绍而后快的合理解释。^②

二

隋亡唐兴,南北融合,会稽孔氏积极入仕。《旧唐书·孔绍安传》:“绍安大业末为监察御史。时高祖为隋讨贼于河东,诏绍安监高祖之军,深见接遇。及高祖受禅,绍安自洛阳间行来奔。高祖见之甚悦,拜内史舍人,赐宅一区、良马两匹、钱米绢布等。时夏侯端亦尝为御史,监高祖军,先绍安归朝,授秘书监。绍安因侍宴,应诏咏《石榴诗》曰:‘只为时来晚,开花不及春。’时人称之。”^③孔绍安在隋末就与李渊关系密切,所以,在武德年间对唐朝有着极为主动的政治意识,武德五年,已经官至中书舍人。《新唐书·孔述睿传》:“曾祖昌字,字广成,贞观中对策高第,历魏州司马,有治状,帝为不置刺史。为政三年,玺书褒美,进膳部郎中。”^④孔德绍死于李世民之手,孔昌字为孔德绍之子,贞观年间主动入仕,而且颇有政绩,可见,会稽孔氏对唐朝的政治认同度要比对隋朝的高得多。

王永平认为会稽孔氏有着秉正不挠、重视实务、谙练故实的为政作风,可谓中肯之论,入唐后会稽孔氏在积极入仕的过程中还是保持着这样的从政作风。^⑤

秉正不挠,孔禎、孔若思不畏李唐宗室权贵,《旧唐书·孔绍安传》:

子禎,高宗时为苏州长史。曹王明为刺史,不循法度,禎每进谏。明曰:“寡人天子之弟,岂失于为王哉!”禎曰:“恩宠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国命,

① 《新唐书》卷一九六,第5609页。

② 《文苑英华》卷六四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321页。

③ 《旧唐书》卷一九〇上,第4983页。

④ 《新唐书》卷一九六,第5609、5610页。

⑤ 王永平:《略论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山阴孔氏之从政风尚》,第24—29页。

恐今之荣位，非大王所保，独不见淮南之事乎？”明不悦。明左右有侵暴下人者，祗捕而杖杀之。明后果坐法，迁于黔中，谓人曰：“吾愧不用孔长史言，以及于此！”

先是，诸州别驾，皆以宗室为之，不为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举奏别驾李道钦犯状，请加鞠讯。乃诏别驾于刺史致礼，自若思始也。^①

孔敏行敢于挑战宦官集团，《旧唐书·孔述睿传》：“上疏论兴元监军杨叔元阴激募卒为乱，杀节度使李绛。人不敢发其事，敏行上表极诤之，故叔元得罪，时论称美。”^②时在大和四年，李绛以反对宦官著称，李绛遇害反映的不是李绛与杨叔元的个人恩怨，而是唐代后期宦官专权背景下朝臣与宦官的矛盾激化的产物，所以，孔敏行上表事实上是选择站在了宦官集团的对立面，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孔敏行的政治品质由此可见一斑，推而论之，会稽孔氏秉正不挠的从政作风贯穿唐代前后期。

重视实务，孔昌宇、孔祖舜德泽地方，政绩卓著，《新唐书·孔述睿传》：“曾祖昌宇，字广成，贞观中对策高第，历魏州司马，有治状，帝为不置刺史。为政三年，玺书褒美，进膳部郎中。祖祖舜，字奉先，为监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雉驯于廷。”^③

孔述睿也不乏吏治之才，《旧唐书·孔述睿传》：“述睿好学不倦，大历中，转运使刘晏累表荐述睿有颜、闵之行，游、夏之学。”^④根据常衮《授孔述睿起居舍人制》，孔述睿曾任东都河南江淮南等道转运使判官，当时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的正是刘晏，《新唐书·刘晏传》：“晏歿二十年，而韩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卢徵、李若初继掌财利，皆晏所辟用，有名于时。”^⑤可见，刘晏用人重吏治之才，所以，孔述睿获得刘晏的器重不仅是因为“颜、闵之行，游、夏之学”，还有出色的吏治之才。

谙练故实，会稽孔氏成员多有史才，孔绍安参与撰《梁史》，孔述睿重修《地

① 《旧唐书》卷一九〇上，第4983、4984页。

② 《旧唐书》卷一九二，第5131页。

③ 《新唐书》卷一九六，第5609、5610页。

④ 《旧唐书》卷一九二，第5130页。

⑤ 《文苑英华》卷三八三，第1953页；《新唐书》卷一四九，第4797页。

理志》，时称详究，孔若思则以史才参政，《旧唐书·孔绍安传》：“中宗即位，敬晖、桓彦范等知国政，以若思多识故事，所有改革大事及疑议，多访于若思。”^①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入北的南方士族，会稽孔氏有意识地加强与北方士族的联系，《新唐书·韦安石传》：“子况，少隐王屋山，孔述睿称之，及述睿以谏议大夫召，荐况为右拾遗，不拜。”^②而且，孔望回的亲舅是京兆韦承素，换言之，会稽孔氏已经与京兆韦氏联姻。^③

三

唐代科举取士，尤重进士科，但是，基于强烈的士族意识，会稽孔氏对进士入仕缺乏足够的重视，没有顺应当时士族转型的历史潮流，于是，难以避免地湮没于史料之中。

根据现存史料，会稽孔氏虽然并不完全反对科举制度，但是，以进士入仕者寥寥无几。

孔祯：第进士；孔若思：明经举；孔季诩：擢制科；孔昌宇：制科入仕；孔齐参：制科入仕；孔敏行：擢进士第；孔望回：门荫入仕。^④

事实上，会稽孔氏颇有重文传统，南朝时就以文学著名，隋唐时期也不乏文学之士，如，孔绍安：与词人孙万寿齐名，并称孙、孔；孔季诩：陈子昂称其神清韵远，可比卫玠；孔德绍：与当时辞人虞世南、蔡君和、刘孝孙、庾抱、庾自直、刘斌等登临山水，结为文会。^⑤

可见，会稽孔氏对唐代科举最重要的进士科缺乏足够的重视，这在当时的士族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开成年间，郑覃嫉进士浮华，明确要求废除进士科，《旧唐书·郑覃传》：

① 《旧唐书》卷一九〇上，第4983、4984页；卷一九二，第5130、5131页。

② 《新唐书》卷一二二，第4354页。

③ 《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2页。

④ 《新唐书》卷一九六《孔述睿传》，第5609、5610页；卷一九九《孔若思传》，第5684页。《唐代墓志汇编》，第1563、2182页。

⑤ 王永平：《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孔氏家族文化探论》，第126—130页；《新唐书》卷一九九《孔若思传》，第5683、5684页；《旧唐书》卷七二《刘孝孙传》，第2583页。

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初，紫宸对，上语及选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帝曰：“进士及第人已曾为州县官者，方镇奏署即可之，余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帝曰：“轻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过有崇树。”帝尝谓宰臣曰：“百司弛慢，要重条举。”因指前香炉曰：“此炉始亦华好，用之既久，乃无光彩。若不加饰，何由复初？”覃对曰：“丕变风俗，当考实效。自三十年已来，多不务实，取于颜值。如嵇、阮之流，不摄职事。”^①

但因为进士科已经存在二百年左右，不可能废除，于是，李德裕提出更加有可操作性的方案，《旧唐书·武宗本纪》：“德裕曰：‘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②

唐代士族在科举制度，尤其是进士取士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逐渐转型，由儒学士族转型为文学士族，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旧唐书·崔损传》：“南北两省清要，损皆历践之，在位无称于人者。身居宰相，母野殡，不言展墓，不议迁祔；姊为尼，没于近寺，终丧不临，士君子罪之。加以过为恭逊，接见便僻，不止于容身而已。自建中以后，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数岁罪黜；损用此中上意，窃大任者八年。上亦知物议鄙其持禄取容，然怜而厚之。”^③崔损以进士入仕，士族传统门风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浮华到了极端的程度，可见，郑覃之言不是空穴来风，质言之，唐代士族的转型意味着士族自身的消解，基于强烈的士族意识保持士族传统门风，这是郑覃、李德裕等士族极力反对进士科的真正意义所在。

① 《旧唐书》卷一七三，第4491页。

② 《旧唐书》卷一八上，第602、603页。

③ 《旧唐书》卷一三六，第3755、3756页。

会稽孔氏同样有着强烈的士族意识,《封氏闻见记·讨论》:

著作郎孔至,二十传儒学,撰《百家类例》,品第海内族姓,以燕公张说为近代新门,不入百家之数。

驸马张垪,燕公之子也,盛承宠眷。见至所撰,谓弟垪曰:“多事汉,天下族姓何关尔事,而妄为升降!”垪素与至善,以兄言告之。

时工部侍郎韦述,谄练士族,举朝共推。每商榷姻亲,成就咨访。至书初成,以呈韦公,韦公以为可行也。及闻垪言,至惧,将追改之,以情告韦。韦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奋笔将为千载楷则,奈何以一言而自动摇。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复改。^①

由此可见,会稽孔氏也是为了保持士族传统门风而反对进士科。

《隋唐嘉话》:“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②《东观奏记》:“珏字待价,赵郡赞皇人。早孤,居淮阴,事母以孝闻。弱冠,徒步□□□□□□举明经。李绹为华州刺史,一见谓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当掇进士科。明经碌碌,非子发迹之路。’”^③基于对进士科的重视,士族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进士取士的过程中占尽优势,《唐语林·企羡》:“范阳卢,自兴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洋,二年甲子鲍防侍郎知举,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举,计九十二年,而二年停举,九十年中,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④,大量以进士入仕的士族当然并不局限于范阳卢氏,贞元以后,历朝进士士族宰相数量都超过纯门第士族宰相,可见,重视进士,以进士入仕已经越来越成为唐代士族的共识。

这是因为唐代已经废除九品中正,官吏的任用权归属吏部,于是,士族的政治地位发生剧变。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整个唐代,特别是后期,门第不再是首要甚至唯一影响仕途升迁的因素,科举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换言之,影响仕途升迁由一元因素转变为多元因素,正如毛汉光所说:“官宦的腾达,其所以由

① 《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一〇,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4、95页。

② 《隋唐嘉话·朝野僉载》,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页。

③ 《明皇杂录·东观奏记》,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0页。

④ 《唐语林校证》卷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82、383页。

一项因素发展成多项因素,原因甚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圈内竞争’,缘因士族自东汉末叶以降,经魏晋南北朝多代发展,子孙繁衍极多,而官额有限,已无法人人做官,更无法皆做大官,加上或多或少庶姓平民之上升,在农工商阶层之上浮着庞大的官吏候选人群,构成统治阶层内部圈内竞争的压力,故门第不但论姓氏地望且分房分支,同一门第之中,盛支常有较佳的政治前途,论科举则分进士、明经等,而进士较受重视,拥有一项因素者可得到一定限度的仕进与升迁,拥有多项因素者就有较大的机会与发展。”^①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以进士入仕,积极实现自身的转型就成为唐代士族的必然选择。

作为江南弱势士族,入唐后的会稽孔氏不但要与北方强势的关陇、山东等士族争夺政治资源,而且还要面对张说等“近代新门”的挑战,当时的会稽孔氏已经远离乡里,失去了乡里的依托,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进士入仕从而实现自身的转型就成为会稽孔氏保持自身发展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途径,但是,从对进士科的态度来看,不能不说会稽孔氏并没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会稽孔氏逐渐湮没于史料而不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②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吴郡陆氏

《世说新语·规箴》:“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③吴郡陆氏崛起于三国时期,两晋南北朝

①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336页。

② 《新唐书》卷一六三《崔郾传》:“崔氏四世缙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郾、郾、郾凡为礼部五,吏部再,唐兴无有也。”(第5019页)卷一七五《杨虞卿传》:“杨氏自汝士后,贵赫为冠族。所居静恭里,兄弟并列门戟。咸通后,在台省方镇率十余人。”(第5250页)作为传统士族,清河崔氏、弘农杨氏成员在唐代后期却几乎都是以进士入仕,从而为家族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唐代后期众多士族的兴盛都是如此,这与会稽孔氏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③ 《世说新语笺疏》卷一〇,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52页。